

論漢高帝一朝的北境動亂

謝 偉 傑*

摘 要

本文旨在分析漢高祖劉邦時期北方邊境的動亂，以探討劉邦建立漢帝國的過程中所面對的困難，特別是地域文化因素所帶來的挑戰。漢初北方地區動亂的因由，若從領導人而言，似乎不脫被漢室逼反的成分，但進一步探尋動亂背後的動力和原因，本文提出需從地域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所謂地域文化因素，一方面是戰國時代遺留下來的燕、趙地區之本地文化認同，抗拒和反對代表楚、秦文化的漢政權統治；另一方面，本文借用考古學者提出的「北方文化帶」概念，指出燕、趙北方地區在文化上與匈奴趨同，因而容易傾向與匈奴合作或受匈奴影響，爭取匈奴的支持，遂鼓動北境地區的動亂。本文首先敘述漢高祖劉邦統治時期北方動亂的概況，然後從北境地方勢力的領導人因素、北境的地域文化認同，以及北境地方勢力與匈奴的關係三方面進行剖析，從而揭示北境動亂的特性、發生原因和背景。

關鍵詞：漢高祖劉邦、漢帝國、匈奴、北方文化帶、地域文化

一、前 言

歷史上帝國的建立與鞏固，往往經過漫長而曲折的艱苦經營。在政權建立後，首先要鞏固對直轄地方的管治。此後，隨著政權的發展，它的版圖逐漸擴大。然而，當帝國政府把觸角伸向各地時，除了受制於行政運作與資源分配的考慮外，還要顧及權力進入陌生地方時，所需面對的風險和障礙。因

收稿日期：2006年6月5日，通過刊登日期：2007年4月25日。

* 作者係香港培生教育出版亞洲有限公司高級編輯。

此，在建構帝國的過程中，各種勢力交織在一起，互相碰撞。在最顯著的軍事衝突外，各地自身的歷史、文化、地理環境，以至地方權力擁有者的個人因素，往往對帝國的建構帶來阻礙、抵制，甚至進行不同形式的反抗，令建構帝國和鞏固統治的過程更趨複雜。地方上種種心理與物質因素長期發揮著影響力，即使在中央集權大一統帝國「六合同風，九州共貫」¹的表象之下，其實仍然存在著這些力量的長期角力，彼此互為消長。

在中國歷史上，秦帝國的建立，正式結束了周代封建的局面，進入了全國推行郡縣制的時代。秦朝速亡，繼起的漢室一方面承襲秦朝的郡縣體制，另一方面也局部恢復了封建。封建的復行，原因在於劉邦衡量現實環境，明白漢室力量有限，未能對全國各地施行有效統治，而當時封土建國的思潮仍然十分強大，劉邦爲了滿足功臣裂土封王的渴求，並承認既有的地方軍事力量，因而推出了融合折衷的方法——郡國制。然而，漢朝皇帝並不甘於讓郡國並立的局面持續下去，而是爲了締造和鞏固中央集權帝國作出努力。地方力量也爲了自身利益而作出反擊，與中央發生衝突。因此，漢帝國建構的過程，也是一個各地力量激烈衝突的過程。

劉邦將關東地區劃分爲多個王國，分別冊封了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長沙王吳芮、韓王信、燕王臧荼和趙王張敖。不過，劉邦從稱帝的漢高祖五年（西元前202年）開始，便逐步剷除異姓諸侯王，改立同姓宗室王。他在漢高祖十二年（前195年）逝世時，仍然在位的異姓諸侯王，就只剩長沙王吳芮一系。劉邦剷除異姓王，改立同姓，是建構漢帝國的重要一步，也是漢初歷史的重要課題。歷來對於劉邦與異姓諸王之間的衝突，多置於漢帝國中央集權化過程的敘述之中，而當中涉及的白登之圍，以及韓王信、燕王盧綰投奔匈奴等事件，則被視爲漢、匈兩大強權的初步較量，是漢、匈關係的一環。²從中央集權和漢匈關係的角度分析，無疑皆有其意義

1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72〈王貢兩龔鮑傳〉，頁3063。

2 以漢帝國推行中央集權或漢、匈關係的角度論述劉邦與異姓諸王的衝突，可參看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 - A.D. 220*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23-125, 385-386. 白壽彝、高敏、安作璋主編，《中國通史第四卷：中古時代·秦漢時期》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頁290-292。

與重要性，但在這兩個宏大的敘事格局之中，對於劉邦與地方勢力衝突的一些細節卻未有深入探討，從而忽略了當中的特別之處。本文嘗試對漢高祖五年至十二年間的北境動亂作出分析，探尋其出現的背景和原因。

試將劉邦統治時期的漢帝國劃分為南北兩半，以江淮流域為南方，以黃河流域及其以北為北方，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長沙王吳芮均位於南方，而韓王信、燕王臧荼和趙王張敖均屬於北方。先言南方諸王，韓信在漢高祖六年（前201年）被捕，至漢高祖十一年被殺；彭越在同年以謀反罪名被殺；英布亦於是年起兵反漢，並於漢高祖十二年敗死。南方諸王中，長沙國吳氏國小力弱，得以保位，可置不論。韓信是否謀反頗存疑問，彭越更明顯沒有謀反之心，不過因為受到猜忌，不得不死。至於英布，雖然起兵反漢，也不過是因為眼見韓、彭相繼被殺，而自念與他們「同功一體」，³感到自身權位與生命受到威脅，才不得不鋌而走險。從最初韓信被誘捕、廢掉王位，以至最後被殺，也不見彭、英有何異動，可知他們本來沒有反對漢中央的企圖。⁴劉邦對這些南方力量的壓制與清除也頗為順利。

反觀北方，漢高祖五年，臧荼造反；漢高祖七年，韓王信叛投匈奴；漢高祖八年，趙國相貫高等人謀弑劉邦；⁵漢高祖十年，陳豨造反；漢高祖十二年，盧縮叛投匈奴。在這段時期，不論是劉邦所封的韓王信、燕王盧縮，還是擔任邊將職務的陳豨均參與或發動叛亂，漢軍對北方的戰事幾乎從未間斷。原屬戰國時代趙、燕二國的北方邊境，尤為動亂的淵藪，變亂此伏彼起，還有匈奴勢力的介入，令北方的情況比南方更為複雜。北方地區動亂的因由，從其領導人而言，將如本文以下的分析所示，似乎不脫被漢中央逼反的成分，這點與南方諸王的情況相似。然而，單憑此一因素，還不足以掀起持續的動亂。為了探尋動亂背後的動力和原因，本文提出需要從地域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所謂地域文化因素，可從兩方面言之：一方面，這是戰國時代遺留下來的燕、趙地區之本地文化認同，抗拒和反對代表楚、秦文化的漢

3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91〈黥布列傳〉，頁2604。

4 詳細分析可參陳玉屏，〈劉邦與異姓諸侯王〉，《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1995.3: 10-13。

5 趙國大臣貫高、趙午等人謀弑劉邦，雖然沒有發生戰事，但也代表了北方地區對漢朝的反動，本文因此將其一併列入「北境動亂」之中。

政權統治；另一方面，本文將借用考古學者提出的「北方文化帶」之說法，指出燕、趙北方地區在文化上與匈奴有一定程度的趨同，一些動亂參與者因而容易傾向與匈奴合作，並爭取匈奴的支持。換個角度說，匈奴對燕、趙北方地區形成一種拉力，加上匈奴領導人物從中取利的野心，遂鼓動了北境地區的動亂。

本文以下將先敘述漢高祖劉邦統治時期的北方動亂概況，然後從北境地方勢力的領導人因素、北境的地域文化因素，以及北境地方勢力與匈奴的關係三方面進行剖析，從而揭示北境動亂的特性和發生原因、背景。本文希望能夠對於漢初帝國建構的過程，以及漢初與匈奴的關係提供一些認識，或可於此課題上聊備一說。

二、北境動亂概況

漢高祖五年正月，劉邦被諸將相擁立為皇帝，隨後分封功臣，並於五月頒布復員令，天下看來從此安定。然而，燕王臧荼在接受劉邦冊封後，未逾一年，即起兵造反，攻下代地，掀起了漢高祖一朝北境動亂的序幕。劉邦親自率兵進擊，迅速俘獲臧荼，改封親信盧綰為燕王，並派遣樊噲領兵平定代地。

漢高祖六年，劉邦從陳平計，偽遊雲夢，誘捕楚王韓信。之後，他將韓王信從陽翟徙封太原，以之守邊。然而，在漢高祖七年，面對匈奴的攻擊，韓王信竟向匈奴投降。同時，曼丘臣、王黃等人在趙、代地區起兵反漢，擁立故趙將趙利為王。劉邦不敢怠慢，親自率兵進擊。經過多次交戰後，劉邦因連勝而變得輕敵，意圖乘勝追擊，卻招致了史上著名的平城白登之圍，被匈奴圍困七天，才得以狼狽脫身。韓王信、王黃、趙利，以及其他參與亂事的將領均在匈奴的支持下，徘徊於漢帝國的北方邊境，發動騷擾性的軍事行動。從此，北境動亂深深地與漢、匈關係糾結在一起。

平城解圍後，劉邦派遣樊噲率兵平定代地，並冊封兄長劉仲為代王，作為善後措施。當劉邦從平城到洛陽時，途經趙國，接受了趙王張敖的招待。但劉邦對待張敖的態度，卻被趙國大臣們認為無禮之極，激起了他們的怨憤，因而種下了一次反叛他的禍根。漢高祖八年，劉邦從長安出發，率兵前

往北邊，以肅清韓王信的餘部。事後，劉邦在歸途中，路過趙國柏人，趙國大臣貫高、趙午等人即策劃在當地進行暗殺，卻因為劉邦不作停留而計謀未成。同年，代王劉仲棄國逃歸洛陽，因此劉邦以同姓王鎮撫北境的第一次嘗試失敗了。漢高祖九年，貫高等人的行刺計畫被揭露，劉邦對趙國君臣進行處分。趙王張敖被廢為宣平侯，劉邦冊立少子如意為趙王。

漢高祖十年，鎮守趙、代邊境並深得劉邦信任的陳豨聯結王黃、曼丘臣等人在代地舉兵造反。劉邦在震驚之餘，親自率兵平亂。平定陳豨叛亂的軍事行動，從漢高祖十年八月，一直持續至漢高祖十二年為止。在叛亂期間的漢高祖十一年，劉邦為了更有效地控制和防範趙、代地區的叛亂，遂重整當地的行政架構，分割趙、代二地，冊立兒子劉恆為代王，以加強對北方邊境的統治。同年，建漢功臣韓信、彭越相繼被殺，與他倆同功一體的淮南王英布心不自安，起兵反漢。此時的漢帝國，境內南、北均爆發了亂事。驍將英布對漢政權構成了嚴重威脅，劉邦不得不以老病之軀迎戰英布。英布敗走後，劉邦將追擊的任務交由將領負責，他則於故鄉沛稍作停留。這時的劉邦，身心俱疲，自知年事已高，不免有蒼涼之感，因而有「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⁶的感慨之言。英布之敗雖已成定局，但北方的頻繁動亂和匈奴的介入，以及漢帝國邊境上的各種潛在威脅，均成為困擾他的問題。對於如何能夠遏止帝國邊境上的動亂，他憂心忡忡，唱出了「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⁷道出了他對以上問題的關注。

未幾，英布敗死，樊噲也平定了代地亂事，斬殺了陳豨。南、北兩地的動亂看來告一段落了。可是，在漢高祖十二年，竟然發生了劉邦意想不到的事情。與他感情極好的燕王盧綰被控與匈奴勾結，有反叛中央之心。在病中的劉邦先派使者前去收捕盧綰，繼而讓樊噲率軍前往，以圖用武力解決問題。本無謀反之心的盧綰只好逃於塞下，等候機會向劉邦解釋。劉邦改封兒子劉建為燕王。其後，劉邦逝世，未能看見北境問題得到徹底解決，盧綰亦失去了澄清的機會，只好逃奔匈奴。漢高祖一朝的北境動亂以此閉幕。

6 《史記》，卷8〈高祖紀〉，頁389。

7 同上註。

三、北境動亂的領導者

臧荼是漢高祖一朝北境動亂的首事者，也因此成爲第一個被劉邦剷除的異姓王。從現存極爲零碎的史料中可知，他在秦末大亂時爲燕將，因爲隨項羽救趙、入關，以功封王，取代了當時的燕王韓廣。在楚漢戰爭中，他採取據地自守的策略，並未特別表現出對項羽或劉邦的支持。韓信破趙後，臧荼爲了自保而傾向漢方，但亦未見他直接介入戰事之中。項羽死後，他參與聯名上奏，擁戴劉邦爲皇帝，而劉邦也確認他的燕王地位。當他起兵反漢時，已是他稱王的第五個年頭了。

對於臧荼造反一事，史籍所記極爲簡略。《史記》和《漢書》的〈高祖紀〉只云「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⁸及「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⁹對於叛亂的原因和經過，均付之闕如，令事件的內容曖昧不清，啓人疑竇，因而引起學者對「臧荼造反」的真實性提出質疑。¹⁰由於史料的限制，對於臧荼是否叛漢，暫時難以定讞。但是，臧荼造反事件的意義還是清楚的。如果臧荼真的起兵反漢，那麼，這就是漢帝國建立後，北境地區的首次動亂；如果「臧荼造反」不過是漢中央捏造的罪名，則這是漢帝國剷除異姓諸侯王的第一步。不論如何，臧荼事件標誌著漢中央與地方力量之間的角色正式展開。

相對於臧荼事件的模糊，韓王信叛漢的來龍去脈便較爲清晰。韓王信事件，是一次確確實實的北境動亂。無論是持續時間，或是牽涉範圍，均遠過於臧荼事件，其引發之後果，亦影響深遠。

韓王信爲韓國貴族遺裔，秦末動亂時，得張良幫助，成爲復立的韓國的將領，跟隨劉邦入關。劉邦被項羽封爲漢王，韓王信亦隨從到漢中，並參與

8 《史記》，卷8〈高祖紀〉，頁381。

9 《漢書》，卷1下〈高祖紀〉下，頁58。

10 陳玉屏認爲臧荼沒有謀反的理由和可能，所謂「造反」，不過是劉邦爲了剷除他的欲加之罪。詳參陳玉屏，〈劉邦與異姓諸侯王〉，頁42；王愛和亦對事件提出質疑，見 Ai-he Wang, "Creators of an Emperor: The Political Group behind the Founding of the Han Empire," *Asia Major* 14.1(2001): 42-43.

還定三秦。劉邦因此拜其為韓太尉，許諾封為韓王，派其掌兵略定韓地。漢高祖二年，韓王信擊敗項羽所冊立的韓王鄭昌，獲劉邦封為韓王。他參與戰勝項羽，與諸功臣共同擁戴劉邦稱帝，劉邦與他剖符，確立為韓王，都於潁川。漢高祖六年，劉邦「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¹¹ 劉邦徙封韓王信，是因為韓王信的封國潁川位處中原腹地，鄰近洛陽，具有戰略優勢，足以對關中構成威脅。¹² 但韓王信武勇有材略，可資任用，劉邦遂徙封他於太原之北以備胡。¹³ 韓王信被徙封後，深知受到猜疑，因而急於立功自效，¹⁴ 遂主動上書，表明晉陽離邊塞遠，要求徙治馬邑，以對抗匈奴。當年秋天，韓王信面對冒頓單于率領大軍進攻，在強弱懸殊的情況下，他數次遣使與匈奴議和。其事為劉邦知悉，懷疑他有貳心，使人責讓。韓王信恐懼之下，疑不自安，因而以馬邑叛降匈奴，並共同進擊太原。

韓王信之反，就個人而言，當然由於他一直受到劉邦猜忌，令他疑懼不安。在他徙封太原稍前，發生了楚王韓信被誘捕廢王的事件，不能不令他充滿戒心；未幾，自身即遭徙封，他與漢廷的關係可想而知。到了北方後，為求自保和消除嫌隙，他意圖建立邊功，以證明自己的忠誠和能力。可惜，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他只有遣使向匈奴求和。¹⁵ 結果卻被劉邦遣使責讓，韓

11 《史記》，卷93〈韓信盧縮列傳〉，頁2633。

12 漢武帝時，拒絕王夫人封子於洛陽的請求，他的理由是：「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也說明了同樣的道理，可為註腳。見《史記》，卷60〈三王世家〉，頁2115。

13 陳玉屏認為「劉邦徙韓王信於太原郡這步棋，實際上是置韓王信於死地。韓王信非死即罪，罪亦當誅，剩下的只有亡命匈奴一條路了。」見陳玉屏，〈劉邦與異姓諸侯王〉，頁43。陳氏似乎過於簡化事情，未必符合實況。劉邦是擔心讓韓王信居於潁川，但似乎沒有立刻要置他於死地之意，因為如果有意剷除韓王信，根本不需要冒險將他徙封邊境重鎮以備胡，因為若他與匈奴勾結，對漢所帶來的影響更大。

14 宋超指出：「從中原富庶之地遷往西北寒苦邊郡，其中的奧妙韓王信自然知曉……急於立功以解除劉邦的猜忌之心」。見宋超，《漢匈戰爭三百年》（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頁21。

15 當中有兩點可注意：第一，漢初君臣除了一二人如婁敬外，似乎都對匈奴的實力沒有清楚的認識。韓王信固然可能對匈奴沒有切實的認識，因而預備不足，以致被圍於馬邑；劉邦在白登之圍前，遣使十餘輩於匈奴，也被匈奴欺騙，沒有認清匈奴刻意隱藏實力，甚至久經戰陣的劉邦也相信匈奴的不濟。呂后主政時，曾多次參與北境平亂戰鬥的樊噲，還聲言

王信恐怕被殺，只有叛投匈奴一途。韓王信叛投匈奴固然是爲了自身安危設想，¹⁶但我們也不能忽略牽涉事件中的曼丘臣、王黃等人的影響。他們乘時而起，聯結匈奴與韓王信，又擁戴趙國宗室趙利爲王，公開反漢。此後的北境動亂，他們也參與其中。因此，他們可能對韓王信投降匈奴起了勸誘的作用。有關曼丘臣、王黃等人的角色與影響，將留待下節分析。

劉邦親自領軍對抗韓王信與匈奴的聯軍，最終以白登之圍的屈辱告終。事後，劉邦路過趙國，得到趙王張敖的款待，卻引發了一場針對他的叛亂事件。事緣劉邦在趙國作客，作爲他女婿的張敖禮節甚恭，「趙王朝夕袒裼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¹⁷劉邦的無禮既因爲自己是皇帝、岳父，也不脫其流氓本色。劉邦對臣下無禮，爲人所共知。高起、王陵說：「陛下慢而侮人」；¹⁸魏王豹指劉邦「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¹⁹「四皓」嫌劉邦對士無禮；²⁰陳平謂劉邦「恣侮人」；²¹蕭何也說劉邦「素慢無禮」。²²英布初到漢營時，劉邦踞床洗腳接見他，令其羞憤欲自殺。²³這雖然是劉邦有意折英布銳氣，但也可反映他待臣下之一斑。此外，酈食其在陳留拜謁劉邦時，劉邦也是「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被酈生斥爲無見長者禮。²⁴由此可見，劉邦對臣下無禮，

將十萬眾橫行於匈奴中，如此豪言壯語，固然反映了樊噲率直魯莽的性格，但也未嘗不是他輕視匈奴，對匈奴實力沒有清晰認識的表現。第二，韓王信在情急時，遣使向匈奴求和，看似沒有爲漢朝盡忠，但當時離戰國之世不遠，急則求和的事例常見，韓王信不過是未擺脫戰國時代觀念的影響。

16 漢高祖十一年，漢將柴武寫信給韓王信，勸他歸漢。韓王信在覆信中坦言「亡匿山谷間，且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但因爲自身曾降於項羽與匈奴，現又投靠匈奴，與漢爲敵，合共有此三罪於劉邦，實在已不能歸漢了。他的無奈正反映了他的疑不自安，反映了他與劉邦或漢中央已失去互信。見《史記》，卷93〈韓信盧綰列傳〉，頁2635。

17 《史記》，卷89〈張耳陳餘列傳〉，頁2583。

18 《史記》，卷8〈高祖本紀〉，頁381。

19 《史記》，卷90〈魏豹彭越列傳〉，頁2590。

20 《史記》，卷55〈留侯世家〉，頁2405、2407。

21 《史記》，卷56〈陳丞相世家〉，頁2055。

22 《史記》，卷92〈淮陰侯列傳〉，頁2611。

23 《史記》，卷91〈黥布列傳〉，頁2602。

24 《史記》，卷97〈酈生陸賈列傳〉，頁2692。

其來有自。他這次對張敖無禮，激起了趙國群臣貫高、趙午等數十人不滿。他們均已年六十餘，是張敖父親張耳的食客，縱橫於戰國末年、秦漢之際，有遊士、游俠的性格，不能忍受國君被辱，對劉邦的無禮異常憤恨。他們認為「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產生了報仇之心。即使張敖解釋劉邦有大恩於他父子，因而不可背之，但貫、趙等人仍堅持「吾等義不辱」，²⁵ 堅決代主子討回公道，以致他們完全不計後果，不惜殺死劉邦以求一逞，遂有漢高祖八年於柏人謀刺劉邦之舉。

貫、趙等人的謀殺計畫失敗，涉案各人受到懲處，張敖亦被廢去王位。漢高祖八年，代王劉仲因為邊境的嚴峻形勢，棄國逃歸洛陽。當時，劉邦已冊立少子如意為代王，而現在張敖被廢，劉邦重整趙、代地區，委任心腹陳豨監領趙、代邊兵，守禦北方。不過，出乎劉邦意外的是，陳豨於漢高祖十年舉兵反漢。據史籍所載，陳豨反漢與楚王韓信有關。陳豨在前赴北邊履任時，曾與被廢為淮陰侯而困居長安的韓信會面。韓信向他披露謀反之意，游說陳豨與他合作，屆時陳豨反於北邊，韓信在長安策應，必可傾覆漢室。陳豨相信韓信的軍事才能，因而同意合作。結果，陳豨反於北邊時，韓信便於長安意圖發起叛亂。不過，這一說法有可疑之處。首先，韓信與陳豨的密談，如何可以鉅細無遺地記錄下來？韓信在亂事發生時，被呂后和蕭何合力殺害，陳豨亦於後來陣前被斬，據情況來考慮，兩人均不可能留下如此確鑿之供詞。若說是二人部下的證詞，則毋寧認為是一心剷除韓信的呂后或其他欲除去韓信之人所製造的「證據」。何況，韓信是否確有謀反，實存有疑問，不能否定呂后可能乘劉邦率兵在外時，利用機會剷除韓信，然後再加上意圖謀反的罪名。觀乎其後彭越與盧縮的事例，可知呂后與諸侯王、功臣的緊張關係。如此，我們對陳豨謀反與韓信的關係，需持審慎的態度。

陳豨深得劉邦信任，派他「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²⁶ 為何他仍要謀反呢？撇開與韓信合謀一點不論，他謀反的一個關鍵因素是他受到猜疑，為了自保而起兵作反。史載陳豨仰慕戰國公子豢養食客之風，也仿而效之，「待賓客布衣交，皆出客下。」²⁷ 當他從代地休假，經過趙地時，「賓

25 《史記》，卷89〈張耳陳餘列傳〉，頁2583。

26 《史記》，卷93〈韓信盧縮列傳〉，頁2639。

27 《史記》，卷93〈韓信盧縮列傳〉，頁2640。

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客舍皆滿。」²⁸引起了趙相周昌的警惕，因而向劉邦上言，指陳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帝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²⁹

當中可注意者有二：第一，陳豨因盛養遊士而惹禍。陳豨養士，反映了當時離戰國之世未遠，他仍受戰國養士遺風的影響，但在大一統政權下，這成爲了對中央的挑戰，是中央集權力量所不能容忍的。第二，陳豨在受到猜疑而密謀反叛時，派人與王黃、曼丘臣聯絡，最後並聯結王黃等人反漢。王黃、曼丘臣等人再次在北境動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漢高祖十二年，傳來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燕王盧綰謀反。病中的劉邦大爲震驚。盧綰與劉邦自幼一起長大，親密程度，群臣莫比。因此，劉邦在平定臧荼後，破例冊封盧綰爲燕王，以尊寵自己的至交好友。盧綰一直忠於漢室，在陳豨叛亂中，盧綰配合劉邦圍剿叛軍，並派遣使者張勝出使匈奴，以斷陳豨外援。然而，張勝在匈奴之中遇上故燕王臧荼之子臧衍，勸說他讓匈奴與陳豨合作，以令燕國得以在漢、匈之間保持重要性。張勝對此深表同意，而盧綰在衡量形勢後，也肯定了張勝的做法，以令陳豨與漢朝連兵不決。這一計畫在陳豨死後，因爲投降的裨將向漢朝吐露而揭發。劉邦遣使驗問，燕國君臣均作迴避。最後，劉邦知道張勝亡在匈奴中，因而認定盧綰作反，遂遣樊噲領兵進擊。盧綰不得已，只好「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³⁰可惜，劉邦未幾病逝，盧綰申訴無門，又怕被呂后殺害，只好投奔匈奴，抑鬱而終。

盧綰叛亂事件，匈奴關涉甚深。盧綰是因爲和匈奴通使而被指控叛漢，當他不容於漢時，也是投奔匈奴以自保。在盧綰而言，他之所以被張勝說服，借漢、匈矛盾以自固，是基於漢廷與諸侯王存在矛盾的大前提。盧綰自言：「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

28 同上註。

29 同上註。

30 《史記》，卷93〈韓信盧綰列傳〉，頁2639。

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³¹ 他對劉邦尚有信心，希望待劉邦病愈而自入謝。但對於呂后，他非但不相信，且深為懼怕，恐怕自己步韓、彭的後塵。從中可以看出，盧綰之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漢廷與諸侯王之間疏離與猜忌造成的。

從以上分析，可知漢高祖時期的北境動亂，基本上是漢中央與地方勢力的矛盾所促成的，是雙方權力衝突的表現。就現有的史料來看，除了陳豨自稱代王外，其他的動亂並沒有顯示出主事者明顯的野心。北境動亂，就領導人物而言，主要還是因為猜疑與衝突逼出來的。但是，亂事最終能夠實現，還演變為大規模的武裝衝突，並持續了頗長的時間，我們不可不進一步探討北境動亂的動力，以及當中如王黃、曼丘臣等人的角色與作用。

四、地方意識與北境動亂

秦、漢社會去古未遠，邦國並立的封建意識仍普遍存在人們心中，人們的意識和觀念仍然深受戰國以來的風尚所影響。秦始皇雖然併滅六國，締造了統一大帝國，但各地的風俗文化差異，並不會因為政治上的統一而迅速趨於一致。³² 秦國的統治者早已清楚認識到各地文化存在差異，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語書》記載南郡守騰的話：「古者，民各有鄉俗，其所利及好惡不同，或不便於民，害於邦。」³³ 各地風俗文化差異的存在，足以對政府統治和社會秩序帶來不良影響。因此，秦帝國政府才需要推行「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統一措施，以鞏固並建立全國的一致性。

雖然秦始皇致力整齊風俗文化，要求達致全國秩序的齊一，但是，在秦朝統治的寥寥十多年中，根本未能撼動各地深厚的傳統和地方意識。³⁴ 誠如

31 同上註。

32 秦帝國在政治上達成了統一，但在文化上仍然遇到各地的抵抗，可參劉文瑞，〈征服與反抗——略論秦王朝的區域文化衝突〉，《文博》1990.5: 50-59。陳蘇鎮，《漢代政治與《春秋》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頁2-35。

33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頁15。

34 秦始皇雖努力移風易俗，追求全國的齊一性，但恐怕他心中不能對各地齊一視之。一方面，他擁有征服者的心態；另一方面，他自從經歷了荊軻和高漸離的行刺後，史稱他「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反映了他對東方六國之人心存芥蒂。見《史記》，卷86〈刺客列

胡寶國指出「西漢去戰國不遠，舊有的歷史傳統仍然頑強存在……可以說，政治上結束戰國是秦代，而從文化上看，戰國遠未結束。」³⁵ 劉增貴亦在研究中充分顯示，即使在漢代大一統帝國內，各地的地方觀念和意識仍然根深蒂固，「秦漢帝國雖歸統一，但疆域遼闊，風俗語言各異，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形成不同層次的地域觀念。」而且，「春秋戰國的國家劃分仍常被提及……各國風俗語言之大別仍在。」³⁶ 對於地方風俗文化的不同，漢代人是十分清楚的。《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地理志〉均根據春秋戰國舊境作為地域劃分的標準，以描寫各地的獨特性，³⁷ 正反映了這種地方觀念在當時深入人心。在這樣的基礎上，六國遺民仍然徜徉在春秋戰國數百年來，列國並立所各自產生的地方意識的流風餘韻之中。不論是秦始皇的統一，還是劉邦的漢家天下，均與他們的地方意識發生衝突。

劉邦建立漢帝國，本來就是透過與地方勢力的妥協而來，更間接鼓勵了地方意識的昂揚。「劉邦之稱帝，是以分權而治的多元政治為條件的。」³⁸ 「漢王朝的皇權從起源伊始，就是與秦始皇的『寡人』極權有根本區別的，是建立在分權與共天下的理念之上的。」³⁸ 這種「共天下」的意識，反映在現實上，是各異姓諸侯王與漢室並立，劉邦仿如各諸侯王的盟主，而不足以彰顯他作為皇帝的絕對地位。這無疑削弱了劉邦作為皇帝的權威性，也在事實和理念上動搖了大一統帝國的基礎，間接鼓勵了地方意識的繼續滋長。而

傳〉，頁2537。

35 胡寶國，〈漢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轉移〉，載氏著，《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215。

36 劉增貴，〈漢魏士人同鄉關係考論〉（上），《大陸雜誌》84.1(1992): 15。

37 可參看嚴耕望，〈戰國時代列國民風與生計——兼論秦統一天下之背景〉，載氏著，《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1），頁95-112；周振鶴，〈秦漢風俗地理區劃〉，載周振鶴主著，《中國歷史文化區域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頁107-128；王子今，〈秦漢文化的統一風格與區域特色〉，載氏著，《秦漢區域文化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頁1-23。

38 王愛和，〈漢代的長城與有限皇權〉，載丁新豹、董耀會主編，《中國（香港）長城歷史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長城（香港）文化出版公司，2002），頁77。對於劉邦與諸侯王「共天下」的分析，可參 Ai-he Wang, "Creators of an Emperor: The Political Group behind the Founding of the Han Empire," pp. 24-28；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0），頁133-143。

且，各諸侯王與一眾功臣在建立漢帝國的過程中，均以劉邦為中心。他們表現的是對劉邦個人的忠誠，而非對漢帝國的忠誠，他們對帝國缺乏凝聚力和認同感。³⁹ 李開元透徹地指出，西漢初年的君臣關係是「難以用上下絕對統屬關係加以規定，而在相當程度上具有雙務契約的性質。」⁴⁰ 因此，當他們與劉邦的關係有變時，他們會為自身利益著想而反抗漢室。韓王信、陳豨、盧縮作為地方上的統治者，與劉邦有直接的接觸，一起度過了秦漢之間的戰亂歲月，如果他們也抱有這樣的意識，對漢帝國缺乏忠誠，那麼，北境上的地方將領與人民對漢中央的抗拒更是不難理解了。

秦末大亂，六國復立，地方意識得以從秦朝的壓制下爆發出來。劉邦作為楚、秦文化的代表，卻足以惹來北境地方意識的抵抗。劉邦本為魏人，但他後來遷居楚地，為吏於楚地，生活習尚已融入楚文化當中而成為楚人。在反秦起兵時，他更是楚地的一名軍事領袖，其從龍之臣亦以楚人為核心，劉邦集團無疑是楚國的代表之一。⁴¹

作為楚國代表的劉邦，在進入關中後，又成為了秦的繼承人。他以關中為基地，在政治上以漢承秦，推行秦制，但他在文化意識和喜好上仍深受楚文化的影響，他喜好楚服、楚歌，以及他晚年回到豐沛地區所表現的鄉土情懷均為明證。在劉邦眼中，秦制與楚俗，兩者並不抵觸；在當時人的眼中，漢朝不啻是一個秦、楚揉合的政權。「在秦漢之際的人們心目中，所謂承秦，恐怕主要並不是指繼承前一個時代，而是指繼承關中故秦而言……這樣，『漢承秦制』就由一個時代接續的問題轉換為一個地域問題。」⁴² 雖然秦末大亂，楚人扮演了反秦的主角，⁴³ 但劉邦集團巧妙地融合秦、楚而建立了新政權。其他山東舊國的遺民卻不免視漢朝為秦、楚勢力的代表，對他們構成威脅，而漢帝國的建立，也是秦朝統一政治的復活。各國遺民在反秦動

39 Ai-he Wang, "Creators of an Emperor: The Political Group behind the Founding of the Han Empire," pp. 40-46.

40 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頁185。

41 劉邦集團的楚國性質，可參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頁150-170。

42 胡寶國，〈漢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轉移〉，《漢唐間史學的發展》，頁216。

43 田餘慶，〈說張楚——關於「亡秦必楚」問題的探討〉，載氏著，《秦漢魏晉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27。

亂中，再次勃發的地方意識十分昂揚，因而容易隨時起來反抗漢室，以恢復舊國的統治，這卻是已經貴為皇帝的劉邦所不願見到，也不允許的，因此，雙方的矛盾日益尖銳，衝突在所難免。

各地的地方意識如何回應劉邦與漢帝國的統治呢？劉邦淵源於楚，在進入關中後，得到秦人的擁戴。因應客觀形勢，他以「居關中之楚」消滅「居關東的項羽之楚」，繼承秦始皇，再造帝業。由於他與項羽皆屬於楚，即使他與項羽鬥爭多年，也並未削弱他的楚國色彩。此外，還要注意的是，漢初特重「張楚」法統，承認秦、漢之間有楚的存在，既反映了劉邦承認自身對楚的繼承，也有助他爭取楚地民衆的支持。⁴⁴ 劉邦既承楚、秦而興漢，漢政權自容易為楚、秦兩地所接受。他後來又冊封兄弟劉交為楚王，以宗室兼楚人治楚，有助於安撫當地人心。至於韓、魏舊壤，因地居關中門戶，一直置於秦、漢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其反亂的情緒易受消弭。對於素有「東秦」之稱的齊地，劉邦一方面將韓信由齊徙封楚，避免韓信掌握這個富饒之地；另一方面，「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⁴⁵ 的田氏，尚有田橫在世，與徒屬五百餘人避漢於海島中，劉邦「以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⁴⁶ 遂千方百計要招致田橫，結果發生了田橫與五百壯士的悲劇。此後，劉邦冊封兒子劉肥為齊王，以親王鎮撫當地，「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⁴⁷ 以功臣曹參為齊相，還聽從劉敬的建議，徙齊地強宗田氏於關中，消弭當地的潛在反對勢力。齊地因而服屬中央，在高祖一朝並沒有發生亂事。

劉邦根據劉敬的建議，遷徙了「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⁴⁸ 徙民範圍可說包括了戰國以來各地貴族、強宗大族，其中有燕、趙地區的王國遺裔和地方豪族，那麼，當地為何仍會發生反漢動亂呢？

歸納起來，其原因既因為趙、燕舊地對秦、楚文化混合而成的漢朝產生

44 同上註，頁24-25。

45 《史記》，卷94〈田儻列傳〉，頁2648。

46 《史記》，卷94〈田儻列傳〉，頁2649。

47 《史記》，卷52〈齊悼惠王世家〉，頁1999。

48 《史記》，卷99〈劉敬叔孫通列傳〉，頁2720。

抗拒，也因為漢朝對當地最初未有封立同姓宗室諸王，或由中央直接控制，讓心懷不滿者或野心家有機可乘，至於當地的民風習尚與地理因素更起著關鍵作用。《史記》〈貨殖列傳〉記述趙、代地區的風俗云：

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懼伎，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其民羯彘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僇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懷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治，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⁴⁹

《漢書》〈地理志〉還補充道：

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為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娶送死奢靡。漢興，號為難治。⁵⁰

可見趙、代地區鄰接胡族居地，受胡人的影響，本已民風剽悍，又好為任俠，經趙武靈王的軍事化鼓吹後，當地尚武之風更盛。趙地之人「尚氣任俠剽悍矜伎，失意則悲歌忼慨，鋌而走險，在所不顧。」⁵¹ 因此貫高等人不惜謀刺劉邦，以求報張敖屈辱之仇。⁵²

至於燕地，其俗亦有類於趙、代。史載：

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⁵³

其地人民「俗愚悍少慮，輕慮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⁵⁴ 漢武帝也曾說：「生子當置之齊魯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⁵⁵ 足見其地民風之一斑。燕、趙、代地民風類同，同處北邊，深受北方胡族的影響，即以燕國而

49 《史記》，卷129〈貨殖列傳〉，頁3263。

50 《漢書》，卷28下〈地理志下〉，頁1656。

51 嚴耕望，〈戰國時代列國民風與生計——兼論秦統一天下之背景〉，《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頁100。

52 對於趙地文化特色，可參王子今，〈趙地社會文化的特色〉，載氏著，《秦漢區域文化研究》，頁60-75。

53 《史記》，卷129〈貨殖列傳〉，頁3265。

54 《漢書》，卷28下〈地理志下〉，頁1657。

55 《史記》，卷60〈三王世家〉，頁2118。

言，其「北疆必多非華夏居民」。⁵⁶ 趙、代、燕地區鄰接北邊，與胡人雜處，其所受北方胡人的文化影響及日常交流，對當地發生反抗漢室的動亂關係匪細，留待下節探討。至少，從史料所見，北境地區表現出一種尚氣任俠，桀驁難制，急迫之時願意鋌而走險，在所不計的民風，配合趙、燕地區昂揚的地方意識，一時間難以對漢帝國形成向心力。再者，地方文化傳統深厚，外來統治者需要從俗而治，依賴本地人進行統治，這又對外來統治者產生影響。⁵⁷ 因此，韓王信、陳豨、盧綰易於受當地人影響，形成了對中央的反亂。

從韓王信和陳豨的動亂中，多次出現曼丘臣和王黃的名字。這二人均參與動亂，而且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他們既是動亂一方的將領，也是溝通匈奴與動亂力量之間的媒介人物。韓王信因劉邦進擊而亡走匈奴時，「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⁵⁸ 史載曼丘臣為上郡白土人，⁵⁹ 居於北邊，王黃更被稱為「胡人」，⁶⁰ 他們當與匈奴有密切關係，因而招引匈奴為援。陳豨反漢時，也派王黃為使，向匈奴求救。在韓王信敗走時，曼丘臣與王黃為了增加對趙地民衆的號召，擁戴趙利為王，出現了曇花一現的趙國復國運動。此次以趙利為王的事件，也許令劉邦及漢中央的支持者如劉敬認識六國遺裔散在民間的不利，因而在後來的徙民行動中，包括了趙、魏等國的後人。陳豨反漢時，與曼丘臣聯合對抗漢軍，王黃更被稱為陳豨別將、大將。我們相信，曼丘臣與王黃只是衆多北境反亂中的將領和溝通匈奴的人物代表，其人數當不在少。他們均在反漢的北境動亂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至於北境的普遍民衆，在北境動亂之中的態度如何，史料雖闕，但我們仍然可以窺見端倪。在陳豨反漢時，劉邦首先的應對策略是以寬大的態度對待趙、代地區的臣民，「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誑誤劫略者」。⁶¹ 當他領軍到達

56 嚴耕望，〈戰國時代列國民風與生計——兼論秦統一天下之背景〉，《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頁101。

57 陳蘇鎮，〈漢初王國制度考述〉，《中國史研究》2004.3: 36-40。

58 《史記》，卷93〈韓信盧綰列傳〉，頁2633。

59 《史記》，卷93〈韓信盧綰列傳〉，《集解》引張晏曰，頁2634。

60 《史記》，卷95〈樊鄴滕灌列傳〉，頁2657。

61 《史記》，卷93〈韓信盧綰列傳〉，頁2640。

邯鄲後，趙相周昌上奏，以常山郡二十城失守，要求斬常山守、尉，以作懲戒。劉邦卻認為常山守、尉並沒有參與謀反，不過是力量不足，未能抵禦叛軍，因而赦免他們，並讓他們復職。其後，劉邦要求周昌舉薦趙地適合為將的人選，周昌舉薦四人，劉邦雖然知道此四人不堪重任，仍各封千戶，任命為將。當左右諫阻時，劉邦解釋說：「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不以慰趙子弟！」⁶² 劉邦說以羽檄徵天下兵而未有至者，或許言過其實，即使當時梁王彭越稱病，未有隨劉邦北上，仍然派將領帶兵參與。要注意的是，劉邦封四人為將，其目的就是要籠絡趙地子弟為他效力。其後，劉邦親自圍攻東垣，有守城士卒辱罵劉邦，及至東垣城降，劉邦斬殺了辱罵他的士卒，對於其餘人等，則寬大處理。⁶³ 之後，劉邦分割趙、代兩地，以兒子劉恆為代王，既以親子鎮撫當地較為可靠，也藉以向趙地民衆表示對當地的重視，因而以皇子出鎮。

其實，劉邦對趙地民衆的反抗情緒是早有認識的。在楚漢戰爭時，他便派在趙地深得人心，且趙人多為其耳目的張耳，與韓信一起進軍趙地，後來更封張耳為王，以安撫趙地人心。此外，劉邦曾經在經過趙地時，封樂毅之孫樂卿為華成君。樂毅為戰國時代燕、趙名將，劉邦封其後人，有招慰燕、趙民心之效。

漢高祖十二年，當陳豨被殺，趙、代地區的動亂被平定後，劉邦再次下令赦免代地吏民。其後，燕王盧綰反，劉邦也赦免燕地吏民，以收人心。在逝世前數月，劉邦還下令為秦始皇、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魏公子無忌、齊潛王、趙悼襄王等置守冢。此舉明顯是為了安撫各地人心，是鑑於趙、代、燕地區的長期動亂，而推行的安定民心的舉措。

62 《史記》，卷93〈韓信盧綰列傳〉，頁2641。

63 《史記》，卷93〈韓信盧綰列傳〉記為「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頁2641；而卷8〈高祖紀〉則記為「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頁388-389。兩者記載對「不罵者」有用刑與否的區別，但以當時劉邦一心平定叛亂，安撫趙人的情況而言，估計他應該會寬待不罵者而不加刑罰。

五、匈奴與北境動亂

北境動亂的發生與持續，與匈奴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匈奴在北境動亂中構成了一種助力，也形成了一種拉力，助長了北境的動亂。以下，首先看看匈奴在北境動亂中的角色，及其與動亂的關係。之後，我們進一步探討匈奴介入北境動亂中的地域文化因素，實由於匈奴與燕、趙地區同屬北方文化帶而有以致之。

早在戰國後期，匈奴已經成爲中原諸國在競爭中需要考慮的一個角色。匈奴長期侵擾趙國邊境，趙將李牧曾經痛擊匈奴，破殺其十餘萬騎。燕國太子丹收留得罪秦王的秦將樊於期，燕太傅鞠武就勸太子丹不要惹禍上身，建議讓樊於期投奔匈奴，並聯合三晉、齊、楚、匈奴共圖秦。可見，匈奴在戰國後期已成爲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因地形之便，與趙、燕二國的接觸尤爲頻繁。秦始皇掃平六國後，派蒙恬北擊匈奴，把匈奴逐出河套地區。當秦末大亂時，匈奴捲土重來，收復了鄂爾多斯地區，對中原政權構成威脅。

漢高祖七年，匈奴對馬邑發起攻擊，結果韓王信叛漢，並與匈奴聯合對抗漢軍，最終發生白登之圍。在這次事件中，王黃、曼丘臣等人扮演了中間媒介人物的角色，招引匈奴進兵晉陽。此後，匈奴雖與漢和親，但仍侵擾不止。韓王信也爲匈奴將兵，侵擾漢朝邊境。陳豨反漢，匈奴再次介入。韓王信指使王黃等人遊說陳豨合作，更親自領胡騎入居參合以拒漢。陳豨反漢，透過王黃爲中介人，向匈奴求助。燕王盧綰亦派遣張勝出使匈奴，以求說服匈奴放棄援助陳豨。張勝在匈奴境內遇見前燕王臧荼的兒子臧衍。臧衍對張勝說：「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⁶⁴張勝亦如王黃般爲漢胡之間的媒介人物，懂胡語，習胡事。臧衍的說詞能夠打動張勝和盧綰，正因爲基於燕國朝廷與漢廷之間存在猜嫌。在異姓諸侯王相繼被廢殺後，盧綰曾說：「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⁶⁵燕國君臣充

64 《史記》，卷93〈韓信盧綰列傳〉，頁2638。

65 《史記》，卷93〈韓信盧綰列傳〉，頁2639。

滿戒懼之心，恐怕為漢所廢，因而挾匈奴以自重。而且，通曉胡事的張勝的想法，可能正代表了部分燕地人物的心態，即對地方充滿認同，而對漢室缺乏認同感，因而願意留於匈奴之中，以為燕地設想。

曼丘臣、王黃、張勝，以及陳豨手下的一眾商人出身的將領，⁶⁶均代表了趙、代、燕地區的漢胡媒介人物。他們對漢帝國缺乏認同，只注重自身地區的認同，甚至傾向於匈奴過於漢中央。其中原因，實由於他們處於「北方文化帶」之中，與匈奴文化趨近，易受匈奴的影響。

根據考古學者的研究，所謂「北方文化帶」，也稱為「中國北方長城地帶」，是指「中國北方地區長城沿線青銅文化帶，西起隴山，向東至鄂爾多斯高原，再向東到桑乾河河谷至燕山。這是一個位於中原農業文化以北，其自然環境、經濟類型、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都有著自身特點的地區。」⁶⁷以現代的行政區劃而言，其地包括內蒙古和遼寧，陝西、山西和河北的北部。⁶⁸這一地帶「正處於歐亞大陸草原與中國農業文明的交界地帶」，⁶⁹「是在東周時期逐漸形成的橫互於中原農業地區和歐亞草原游牧地區之間的一條狹長地區」，⁷⁰是農牧交錯、混合經濟的地區，越向北方，其農業比重逐漸減少，畜牧成分逐漸增多，表現了與歐亞草原經濟類型的發展一致。其實，漢代人對此早有認識，司馬遷就以「龍門、碣石」一線，劃為當時農業經濟與牧業經濟的地區分界。⁷¹

66 陳豨手下多商人，往來貿易於漢、匈之間，政治立場反覆。Ying-shih Yu, "The Hsiung-nu," in Denis Sinor,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22.

67 楊建華，《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北方文化帶的形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1。這個地帶可以分為三個相對獨立的區域，即以隴山為中心的甘肅寧夏地區、以鄂爾多斯高原、岱海為主的內蒙古地區和以桑乾河、燕山為中心的冀北地區。本文只集中於相當戰國時代趙、燕兩國北境的一段。

68 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5.

69 楊建華，《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北方文化帶的形成》，頁2。

70 楊建華，《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北方文化帶的形成》，頁173。

71 《史記》，卷129〈貨殖列傳〉，頁3254。從生態角度考察長城的規劃，可參考王子今，〈秦漢長城的生態史考察〉，載丁新豹、董耀會主編，《中國（香港）長城歷史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頁62-69。

根據考古工作者對「北方文化帶」墓葬遺存中的各類青銅器如車馬器、工具、武器和佩飾等，和各類陶器，以及墓葬形制的分析，顯示了從春秋後期至秦朝，這一地帶所表現出的物質文化差異逐漸縮小，整個北方系青銅文化區內的文化不斷融合，逐步形成了中國的「北方文化帶」。這一時期的北方文化區，從馬具、武器和動物紋飾中顯示，已經逐漸與草原文明趨於融合，表現出一致性，代表了人們的文化認同。⁷²

自然環境有助促成文化融合，「整個文化帶的人們不僅具有建立在相同經濟基礎上的生活方式，而且具有大體相同的風俗習慣與價值觀念。」⁷³這有力地凝聚了文化帶上的人們，也成為了戰國時代崛起的匈奴聯盟內部凝聚、自我認同，而能延續幾百年的基礎。當然，在這條「北方文化帶」上，越向西部的，其游牧經濟越佔主導地位，其與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一致性也越高；相反，越向東部的，游牧與農耕的比例就不那麼懸殊，而與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一致性也相對較弱。考古學者已指出「與內蒙古地區相比，東部的冀北地區由於燕國向北擴展的勢力強勁，北方系青銅文化受到很大的壓抑」，⁷⁴而且，冀北地區是文化帶中受到中原文化影響最大的一段。戰國時代，秦、趙、燕三國因向北拓展而修築長城，⁷⁵「靠著長城，把自然條件較

72 本文借用「北方文化帶」的概念進行討論，至於其考古發現與證據，限於篇幅，不能在此列舉，有關內容詳見楊建華，《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北方文化帶的形成》，頁8-132；林澐，〈中國北方長城地帶游牧文化帶的形成過程〉，《燕京學報》（北京大學）14（2003.5）：95-145；馬利清，《原匈奴、匈奴——歷史與文化的考古學探索》（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5），頁42-105；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pp. 44-90.

73 楊建華，《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北方文化帶的形成》，頁132。

74 楊建華，《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北方文化帶的形成》，頁127。

75 以往多認為戰國時代，秦、趙、燕三國修築長城是為了抵禦匈奴、樓煩、東胡等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犯，因此，長城是防守性的。近年來，中外學者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看法，認為長城的修建是進攻性的，是三國向北方拓展的衍生物。Nicola Di Cosmo對此有細緻分析，請參看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pp. 138-158. 中國學者方面，白音查干也提出了三國長城是中原勢力向北擴展的結果，詳參白音查干，〈戰國時期燕、趙、秦長城新論〉，《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1995.5：51-55。此外，對於長城的研究，可參考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51.

差，但還比較適於發展農業的沿邊地區圈到長城內，以長城為保障，向北推展耕種區。」⁷⁶長城的出現，是人為的在北方文化帶上劃分界線，構成了對北方地區的巨大壓力，使得北方各地的聯繫更為緊密，從而加速了文化帶的形成與鞏固，逼使長城以外的草原居民形成巨大的匈奴聯盟。⁷⁷

秦、趙、燕長城的布局影響了北方文化帶的發展，「東邊的燕長城遠遠超過了北方文化帶的分布範圍，把冀北地區的北方文化地區包在其中；內蒙古的趙長城絕大多數都在北方文化帶之外，……秦長城就在北方文化帶中間穿過」，⁷⁸從中反映的現象是，「越向東，長城的位置越靠北，把原有的北方文化帶深深地囊括其中；越向西，長城的位置越靠南，逐漸在北方文化帶之中穿行。」⁷⁹三國長城建立後，北方文化帶被人為地一分為二，當地的土著居民也被分解，長城以內的居民逐漸融入中原文化；長城以外的人們，大多歸於遊牧文化。長城以內的北方文化帶的發展逐漸結束，而處於長城以外的北方文化帶繼續發展，並受到更深的來自歐亞草原的影響，匈奴在長城以外

76 王子今，〈秦漢長城的生態史考察〉，《中國（香港）長城歷史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頁62。

77 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pp. 138-158. 長城與遊牧世界形成的關係，可參考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7），頁119-150。順帶一提，美國人類學家 Barfield 提出，匈奴的結合不是源於自身的改變，而是為了從南方富裕的中原政權中攫取利益。他的說法曾經引起廣泛討論。但這樣的看法忽視了民族和文化認同的因素。限於篇幅，本文對 Barfield 的說法不作評論，對於其說，詳參 Thomas J.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221 BC to AD 1757* (Cambridge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1996), pp. 5-11, 32-51; "The Shadow Empires: Imperial State Formation along the Chinese-Nomad Frontier," Susan E. Alcock et al., *Empires: Perspective from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0-35. 對 Barfield 的批評，可參看王明珂，〈評 Thomas Barfield 著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新史學》2.3(1991.9): 163-173; David C. Wright, "Wealth and War in Sino-nomadic Relation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25.3 (1995.9): 295-308. 此外，對 Barfield 與 Di Cosmo 有關匈奴的討論的扼要比較，可參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8.

78 楊建華，〈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北方文化帶的形成〉，頁139-141。

79 楊建華，〈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北方文化帶的形成〉，頁141。

日漸壯大。換一個角度而言，正因為燕國北邊地區在自然生態與生業上較接近中原，所受到的中原文化影響在北方文化帶中為最多，因而不易從中原脫出，成為北方遊牧民族的一份子。然而，冀北、代北地區畢竟長時期在北方文化帶之中發展，趙國的北方邊境也深受北方文化的影響，而且經過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和向北拓土，⁸⁰ 受到草原文化的影響更深。再者，以長城來劃分的界線並非一成不變的，它會隨著環境的變化和南北實力的盛衰而有所進退，顯示出當中的可滲透性。

在漢初，北方文化帶的影響餘波未了，當地人容易受到匈奴的影響。在這樣的北方與中原文化交互作用的薰陶之下，產生了王黃、曼丘臣、張勝等媒介人物。他們對中原文化和政權沒有足夠的認同感，而充滿了濃厚的地方意識，與匈奴也易於趨同。當需要外力援助時，既因為現實權力和利益的考慮，也因為地理文化因素的影響，促成了他們向匈奴靠攏。在匈奴方面，也因為現實的利益和地理文化因素而願意為他們提供支援，從而與漢高祖一朝的北境動亂糾纏在一起。

六、結 語

劉邦在位期間，漢帝國北方邊境因為動亂，幾乎無歲不戰。究其原因，除了因為地方上的統治者為了個人目的而發起亂事外，更重要的是趙、燕地區的地方意識，使當地人們對漢中央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不論是地方上的統治者，還是將領或民衆，均對代表楚、秦的漢中央產生抵抗意識。北境地區處於北方文化帶之中，形成了一種介於漢、胡文化之間的「邊緣社會」。⁸¹ 因為地理環境的影響，⁸² 當地人與北方遊牧民族交往頻繁，產生了曼丘臣、

80 Di Cosmo 認為趙武靈王可能於本地招募騎兵，其對象就是那些居於邊界，與遊牧民族有頻密接觸，熟悉遊牧文化的人。見 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p. 137.

81 有關邊緣社會的分析，見邢義田，〈從古代天下觀看秦漢長城的象徵意義〉，《燕京學報》（北京大學）13(2002.11): 29-45。

82 正因為地理環境的關係，匈奴只能對北境地區發揮影響力，而不能進一步南下。管東貴認為平城之役後，「當時匈奴要推翻漢朝，甚至淪中國為牧場，並非無可能。」見管東貴，〈漢於武帝時期扭轉北疆情勢的原因分析——從過去看現在〉，載林恩顯主編，《國際中國邊

王黃、張勝等媒介人物，唆使或煽動趙、燕地區的地方領導人物走上反漢的道路，並與匈奴合作。歸納起來，本文透過北境地方領導人的個人因素，北境的地方意識，以及北方文化帶的影響三方面，分析漢高祖一朝北方動亂的背景與原因。

在本文結束之前，我們試對應上述三點，簡述劉邦如何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首先，劉邦在有生之年，逐步平定了北境動亂，動亂的領導者如韓王信與陳豨均戰死，盧縮逃入匈奴之中，並死在那裡。劉邦在平定動亂的過程中，逐步冊封同姓宗室為王，代替異姓王，達到以同姓鎮撫天下的目的。他以兒子如意為趙王、恆為代王、健為燕王，以親兒出鎮當地，既令他更為放心，也向當地民衆顯示了他對當地的重視，從而有一段時間內消弭了動亂的潛在威脅。代王劉恆成為皇帝後，仍多次行幸代地。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藉此向當地表示關注，增加自身與當地的聯繫，以防動亂。雖然，同姓諸侯王日久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在漢景帝時出現了七國之亂，趙國也是動亂的參與者。不過，就劉邦當時所處的環境而言，分封同姓諸王是較為可取、有效的措施，既可以借重同姓進行統治，也符合當時人們對封建的殘餘意識和眷戀。

至於地方認同的問題，劉邦只能寄望通過改易異姓王為同姓王，逐步加強漢室對地方的影響，以長期經營達致移風易俗的目標。然而，地方認同意識有很強的生命力，難以根除。即便封立同姓宗室王，王國的地方性仍然會對外來統治者產生影響。⁸³在同姓諸侯王的問題解決後，漢朝仍然需要不斷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地方認同意識對兩漢政治，以至歷朝歷代均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也是一個持續為古今中外政權所需要面對的課題。

劉邦在白登之圍中僥倖脫身，認識到漢朝的力量暫時還不能解決匈奴問題，只能夠採納劉敬的建議，以「和親」換取與匈奴表面的和平。這權宜之

疆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政治大學，1985)，頁315。管氏之論過於誇大匈奴的力量，並沒有考慮到地理因素、後勤補給等問題對匈奴南下的制約。對於地理環境如何限制匈奴的南下，轉而願意與漢室議和，可參考Michael R. Drompp, "Centrifugal Forces in the Inner Asian 'Heartland': History versus Geography,"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3(1989): 140-142.

83 陳蘇鎮，《漢代政治與《春秋》學》，頁36-40。

計未能有效解決漢、匈的衝突，但多少可以緩和兩者的緊張關係，也為漢朝爭取到了「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⁸⁴的共識。匈奴問題是兩漢統治者所面對的重要課題，一直未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北方游牧民族與「北方文化帶」之間的文化聯繫，並非一朝一夕而成的，因此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單憑政治力量就能切斷這樣的文化紐帶。地域文化因素仍將不斷發揮影響力，成為帝國建構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變數。

附表一 漢高祖一朝北境動亂大事年表

時 間	事 件
漢高祖五年（西元前202）	燕王臧荼反，被漢軍擊敗，劉邦封盧綰為燕王。
漢高祖六年（西元前201）	徙封韓王信至太原。
漢高祖七年（西元前200）	韓王信反漢，與匈奴聯合侵漢。 曼丘臣、王黃擁立趙利為王。 劉邦被圍於平城。
漢高祖八年（西元前199）	劉邦清剿韓王信的殘餘部隊。 劉邦經過趙國，貫高等人計劃刺殺劉邦。 代王劉仲棄國逃歸，劉邦改立兒子如意為代王。
漢高祖九年（西元前198）	廢趙王敖。 徙齊、楚貴族。
漢高祖十年（西元前197）	陳豨反。
漢高祖十一年（西元前196）	劉邦分趙地為二，立代王劉恆。
漢高祖十二年（西元前195）	樊噲平定代地，斬陳豨。 劉邦赦代地民眾。 燕王盧綰反。

84 《史記》，卷110〈匈奴列傳〉，頁2902。

附表二 史籍中所見北境動亂參與將領一覽

參與事件	人 物	資料出處
漢高祖七年 韓王信反漢	白土人曼丘臣、王黃、趙利	《史記》，卷93〈韓信盧綰列傳〉，頁2633
漢高祖十一年 陳豨反漢	陳豨將侯敞、王黃、張春、趙利	《史記》，卷93〈韓信盧綰列傳〉，頁2641
	陳豨將乘馬絺、宋最、雁門守圜、雲中守邀、丞相箕肆、將勳、豨丞相程縱、陳武、高肆	《史記》，卷57〈絳侯周勃世家〉，頁2070
	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	《史記》，卷95〈樊鄴滕灌列傳〉，頁2662
漢高祖十二年 盧綰反漢	盧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	《史記》，卷57〈絳侯周勃世家〉，頁2070
	陳豨與曼丘臣部下碁毋卬、尹潘、豨別將王黃 將軍趙既、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太僕解福 盧綰丞相抵	《史記》，卷95〈樊鄴滕灌列傳〉，頁2657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

二、近人論著

王子今 1998 《秦漢區域文化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王子今 2002 〈秦漢長城的生態史考察〉，丁新豹、董耀會主編，《中國（香港）長城歷史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長城（香港）文化出版公司，頁62-69。

王明珂 1991 〈評 Thomas Barfield 著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新史學》2.3: 163-173。

- 王明珂 1997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公司。
- 王愛和 2002 〈漢代的長城與有限皇權〉，丁新豹、董耀會主編，《中國（香港）長城歷史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長城（香港）文化出版公司，頁77-80。
- 田餘慶 1993 〈說張楚——關於「亡秦必楚」問題的探討〉，氏著，《秦漢魏晉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頁1-27。
- 白音查干 1995 〈戰國時期燕、趙、秦長城新論〉，《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1995.5: 51-55。
- 白壽彝、高敏、安作璋 1995 《中國通史第四卷：中古時代·秦漢時期》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宋 超 1997 《漢匈戰爭三百年》，北京：華夏出版社。
- 李開元 2000 《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北京：三聯書店。
- 邢義田 2002 〈從古代天下觀看秦漢長城的象徵意義〉，《燕京學報》（北京大學）13: 29-45。
- 周振鶴 1997 〈秦漢風俗地理區劃〉，周振鶴主著，《中國歷史文化區域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頁107-128。
- 林 滢 2003 〈中國北方長城地帶游牧文化帶的形成過程〉，《燕京學報》（北京大學）14: 95-145。
- 胡寶國 2003 〈漢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轉移〉，氏著，《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頁214-229。
- 馬利清 2005 《原匈奴、匈奴——歷史與文化的考古學探索》，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 陳玉屏 1995 〈劉邦與異姓諸侯王〉，《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1995.3: 8-15。
- 陳蘇鎮 2001 《漢代政治與《春秋》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 陳蘇鎮 2004 〈漢初王國制度考述〉，《中國史研究》2004.3: 27-40。
- 楊建華 2004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北方文化帶的形成》，北京：文物出版社。
-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 1978 《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
- 管東貴 1985 〈漢於武帝時期扭轉北疆情勢的原因分析——從過去看現在〉，林恩顯主編，《國際中國邊疆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政治大學，頁307-321。
- 劉文瑞 1990 〈征服與反抗——略論秦王朝的區域文化衝突〉，《文博》1990.5:

50-59。

- 劉增貴 1992 〈漢魏士人同鄉關係考論〉上，《大陸雜誌》84.1: 14-24。
- 嚴耕望 1991 〈戰國時代列國民風與生計——兼論秦統一天下之背景〉，氏著，《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95-112。
- Barfield, Thomas J. 1996.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221 BC to AD 1757*. Cambridge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 Barfield, Thomas J. 2001. "The Shadow Empires: Imperial State Formation along the Chinese-Nomad Frontier." in Susan E. Alcock et al., *Empires: Perspective from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0-35.
- Di Cosmo, Nicola. 2005.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rompp, Michael R. 1989. "Centrifugal Forces in the Inner Asian 'Heartland': History versus Geography."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3: 135-155.
- Perdue, Peter C. 2005.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witchett, Denis and Michael Loewe ed. 1986.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 - A.D. 220*.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dron, Arthur. 1991.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ng, Ai-he. 2001. "Creators of an Emperor: The Political Group behind the Founding of the Han Empire." *Asia Major* 14.1: 19-50.
- Wright, David C. 1995. "Wealth and War in Sino-nomadic Relation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5.3: 295-308.
- Yu, Ying-shih. 1986. "The Hsiung-nu." in Denis Sinor,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18-149.

Rebellions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 in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Han Gaodi (202-195 B.C.)

Wai Kit Wicky Tse*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study of the empire-building process of the Han Empire. The author investigates the reasons for the northern rebellions during the reign of Han Gaodi 漢高帝 (Liu Bang 劉邦), the founder of the empire, and points out the factors that hindered the consolidation of Han imperial authorit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ree aspects of the background and reasons for the northern rebellions: the self interests of the regional leaders, the regional cultural factor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Xiongnu 匈奴. The author asserts that the personal ambitions of the rebel leaders were not the only factors that led to the rebellions. In order to grasp the whole picture, the author proposes to look into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cultures.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the former Yan 燕 and Zhao 趙 kingdom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still had great influence at the inception of the Han Empire, and thus formed its own cultural identity and persistently resisted the rule of the imperial authority, which represented a mixed culture of the Qin 秦 and Chu 楚 kingdom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other words, it was a cultural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Zhao-Yan and the Qin-Chu. Furthermore, from a Eurasian perspective, the Zhao-Yan culture was partly similar to the nomadic culture of northern Eurasia, whose representative at the time was the Xiongnu. The concept of “Northern Frontier Belt” proposed by Chinese archaeologists

* Wai Kit Wicky Tse is the senior editor of Pearson Education Asia Ltd. in Hong Kong.

is helpful to elaborate and reveal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rthern frontier of the Han Empire and the Xiongnu.

Keywords: Han Gaodi 漢高帝, Liu Bang 劉邦, Han Empire, Xiongnu 匈奴, Northern Frontier, regional culture